

名人之侣回忆丛书

MEMOIRS BY THE  
SPOUSES OF CELEBRITIES SERIES

# 我与萧乾

文洁若 著

萧乾



广西教育出版社



● 文洁若 著

# 我与萧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我与萧乾

文洁若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11.625 印张 插页 5 210 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201—10,200 册

ISBN 7-5435-1505-9/I·139 定价：6.50 元

(桂)新登字 05 号

1953年，文洁若初识萧乾，共游北海时，萧为她拍下这张照片。次年，姑娘不顾亲友的好意相劝，毅然下嫁萧乾，与他携手共赴前程。



新筑的小家庭是幸福温馨的，然而，他们只过了三年平静生活，便被推入二十二年苦难生涯。



1971年1

月30日，老大  
(左一)到湖  
北咸宁五七干  
校探亲，恰逢  
萧荔十六岁生  
日，全家到温  
泉(离咸宁十  
公里的小镇)  
去合影留念。



平反后的萧氏夫妇作  
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十次  
联袂出访，这对饱经风霜  
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母亲的  
感情丝毫未减，他们经常  
想到：“愿咱们中国人的日  
子越过越强，让世界上瞧  
得起”。图为1986年摄于美  
国华盛顿。

# 枕 边 私 语(代序)



**嘿**,亚克桑,<sup>①</sup> 有个事儿告诉你。  
唔,你说吧。

广西的朋友今天给我来了封信。  
嗯——

约我写写我所知道的你——也就是写咱们这三  
四十年的生活。

---

<sup>①</sup> 亚克桑是日语第三身代名词“他”的译音。婚前,家中每提到萧乾,我们就用这个字。婚后,就一直沿用下来。

你怎么打算？

我倒也想试试。你同意吗？

这话——李辉<sup>①</sup>也问过我。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既不鼓励，也无权干涉。

后来呢？

后来他真地写开了。

后来呢？

他写成之后，要拿给我看一遍。

你呢？

我没看。我说：要是你写别人，我倒可以看看。写我，我看就等于审查了。

那你对他写的满意吗？

难为那小伙子！我们俩年纪差那么多，经历那么不同。他居然能写成那个样儿。你看看我自己那本回忆录<sup>②</sup>吧，就可以看出我们两人的路子不一样。所以两本书倒也并不重复。

---

① 《浪迹天涯——萧乾传》(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

②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香港香港出版公司 1988 年版，北京文联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可我要写的是咱们这三四十年的事，哪能不重复！不过，我的写法儿跟你们两人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儿？

我觉得你的《搬家史》<sup>①</sup> 写得太吞吞吐吐，想说又不敢说，太含蓄。

唉，只能那样啊。我着重的是事，而不是人。

我要是写，就放开了写。

你真要写，我得给你提个要求。

你为什么没向李辉提要求？

因为你是我的“臭妖婆”。

提吧。

写东西不能图一时痛快。对过去，不要纠缠在个人恩怨上。尽量站高一些。

你是说 1957 年？

不止 1957 年。

我看最重要的还是真实。反正只写我亲自经历过的。  
有些事，尽管发生了，还是忘掉的好。

---

① 湖南人民出版社《骆驼丛书》，1987 年版，1988 年再版。即《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六章《我回来落户了》。

比如……

比如 57 年谁凑热闹骂过两声，谁乘机踹过两脚。

嗬，你气量倒真不小。

我气量不大。不过，写过去，不能陷到过去里边去。

说句时髦话：得有点反思。

你都反思了些什么？

多啦。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

比如……

比如靠搞运动来推行革命，这究竟是不是个办法。

嗯，确实是个问题。

每次运动之后，人是变得更善良还是更狠毒；是更诚实还是更狡猾；是更坦荡荡还是凡事都提防着“有朝一日”，步步设防；社会是变得更团结，还是相互之间更存戒心。

是更为公，还是更自私——甚至可以带着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毒打自己的爹妈。自私到完全丧失了理性——对，理性。这可是人类同禽兽的分野。像《培尔·金特》<sup>①</sup> 的妖宫里一样，没有了是非标准，一下子什么都颠倒过来。

① 萧乾译的一出易卜生寓言剧，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革命同理性是对立的吗？

不应该对立。马克思不是站在海德公园的肥皂箱上信口雌黄的。他是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清醒而冷静地分析他那个时代和世界的。无论怎么说，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

一想起那些年月，我就浑身打哆嗦。

问题是，革命非要那么搞吗？

他们就不替国家，替民族前途想想——

能那么想，不就是理性占上风了吗？

不过，要不搞运动，坏人也暴露不出来。要是不闹“文革”，说不定姚文元今天还是响当当的理论权威呢！

可这个代价太大了。一个社会要前进，就应当经常保持革命精神。可那同搞运动不是一码事。当然，搞运动就得打革命这面旗帜。这么一打，宪法就可以被踢到一边去啦。一个国家的宪法倘若随时可以停止生效，那个宪法是不值一文的。政权的稳固，首先要取信于民。宪法是向人民开的一张支票，它应随时可以兑现。停止兑现本身，就是政权拆自己的台。紧接着，民法呀，刑法呀，以至交通法规，必然全都垮了下来。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维持宪法的信用和尊严。这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基础。可是至今不那么稳固的，正是这个基础。

你认为还会闹“文革”？

只要人骑在宪法上而不是宪法管着人，这个保票谁也

不敢打。

我至少希望咱们有生之年，别再闹啦。

谁不是这么希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给后世子孙尽多地留几面镜子。希望他们了解点历史，懂得路是怎么走叉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大家都来回顾一下那些难忘的日子。回顾，是为了不再重演。领导如果真下决心不再重复错误，就会准许回顾。还有什么比通过回顾来确保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更有利于安定团结呢。

所以你不反对我也写写……

嗯，写过去，可要面向未来。

我对你写的回忆录还有个意见。

说吧。

你只写到 1978 年的“重见阳光”，没把这光明的十年，翻身的十年，也写一些。

这十年的都摆在那里呀，何必去写。

不，比如你这近十次的出国。

我觉得没意思，我不想去炫耀什么。

可这十年多次陪你出访，在我这个没出过大门儿的人，可是新鲜事儿。我认为也不应完全略过去。

你的书随你去写。（哈欠）

世界都睡觉啦。咱们也睡吧。  
世界总得留几个醒着的人……





## 序 曲



东瀛的初夏是怡人的。窗外明丽的蔚蓝色天空上流荡着一团团白絮，我的心几乎随着它们飞回北京。1986年6月，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了，我翻开笔记本，打电话向日本朋友们一一告别。御茶水大学的佐藤保教授对我说：

“啊，真巧，东京大学的丸山升教授刚好在这里，他曾问起过你。我们以为你已经回国了呢。”

我是刚到东京后不久，就陪新加坡大学的杨松年教授去看望佐藤保教授的，在他办公室

的书架上意外地发现了亚<sup>①</sup>的《梦之谷》、《散文特写选》、《一本退色的相册》等书。可惜因为忙，并且知道对方也忙，就不曾打扰。

丸山教授立即接过话筒，约好次日下午他到文京区东洋大学来看我。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准时来到了浴满阳光的教职员会客室。我们坐在皮沙发上，边啜着值班的日本小姐端来的海带茶（据说很有益于健康），边谈话。

我久仰这位日本卓越的汉学家的大名，但过去只晓得他是研究鲁迅的，没想到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他也开始注意到亚的作品，并向研究生讲授像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走的道路。他掌握的资料相当全，并问我为什么选择亚的《饭依》和《栗子》（他已读过前几天才出版的《早稻田文学》第6期，我的两篇译文都是刊载在那上面的），他说他本人最喜欢的是《雨夕》。我回答说，论艺术性，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蚕》和《俘虏》。

两天后，我就登上日航班机回到祖国。

去年10月，丸山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携夫人到我们家来访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教授和《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李辉同志也在座。丸山夫人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谈话用中、日、英三国语言进行。丸山教授把他所写的小册子《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送给我们，那原是发表在日本最有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

① 亚即亚克桑，萧乾的代称，参见前注①。

1988年)上的。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亚的《拟J·玛萨里克遗书》和《往事三瞥》二文,<sup>①</sup>从而去探索亚四十年代末期的心路历程。我征得他的同意,请人译出,附在《萧乾创作道路》<sup>②</sup>一书之后。

丸山教授提到“文革”初期,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由于不明真相,对那场骇人听闻的灾祸还支持过。他却逆着潮流发表了几篇文章,对浩劫给中国传统造成破坏表示了忧虑。一些日本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支持,反而对他围攻起来。那时他身体很坏,但他对夫人说:“不看到中国重见光明的一天,死不瞑目。”

我听了深深感动,对他的卓识也很赞赏,并顺手把李辉刚刚签上名字送给他的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拿过来,翻到第361页,将那句英文“We must outlive than them”最后两个字改为“them all”,指出:“可惜这句关键的话排错了。我原来的意思是:‘一定要活得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长。’因为我不相信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人,会听任自己的祖国这么被糟蹋下去。”

丸山教授称赞我同亚的结合是不平凡的。亚说:“有过我们这样经历的夫妇多得很,而且不少人比我们更不幸。苦难总算熬出了头,如今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① 均见《萧乾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周健男、王嘉良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我们是1954年五一节前夕结缡的，仅仅过了一千多天平静的日子，接着就是二十二年痛苦的煎熬和考验。1979年8月，亚拿到“改正书”之后半年，送他上赴美的飞机时，我才感到这回他真正受信任了。那次的出国本身使背了三十年黑锅的他，如释重负。

经许多朋友的关怀，我们的住房问题也终于妥善地解决了。此刻，我从明亮的玻璃窗里，望着绿草如茵的街心公园，望着通衢大道上那川流不息的车群。我老是想：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吗？会不会忽然又刮起十二级台风，由于某位要人心血来潮，为了争什么或报复谁，突然间又把天地变为昏黑呢？

我的本位工作是翻译。这回，我是反串。这三四年，有三分之二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虽然当了二十多年的“臭妖婆”，但我一直还是感激的。1957年划右派讲究成双配对。多少朋友都是夫妻二人同时成了“阶级敌人”，也即是失去公民自由。我们总算逃掉了那份厄运。

但是在“文革”中，连我这个三门干部也未能幸免。我曾在生死之间彷徨过。最后我打定主意要挺住，活下来做个见证人。现在，总算是能够平静地来回顾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并写下这部一个家庭的浮沉史了。

即便我们这一代可以安度晚年，我也希望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重返。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幸福，文艺科学的繁荣，无不都需要有一个真正安定的环境。

上部

# 朔风劲且哀

